

强大的均平机^{*}

——暴力与贫富不均的全球史

[美] 沃尔特·谢德尔 胡玉娟译

内容提要: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贯穿于整个世界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一些能极大降低贫富差距的机制,而暴力是唯一重要的均贫富手段。暴力表现为四种形式:大规模战争、转型性革命、国家崩溃和大瘟疫。历史经验表明,均贫富政策与变革一般都与暴力震荡联系在一起,在和平背景下能成功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证据。未来如何通过和平方式抑制贫富不均?如果历史可以为鉴的话,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 贫富差距 不平等 暴力 均平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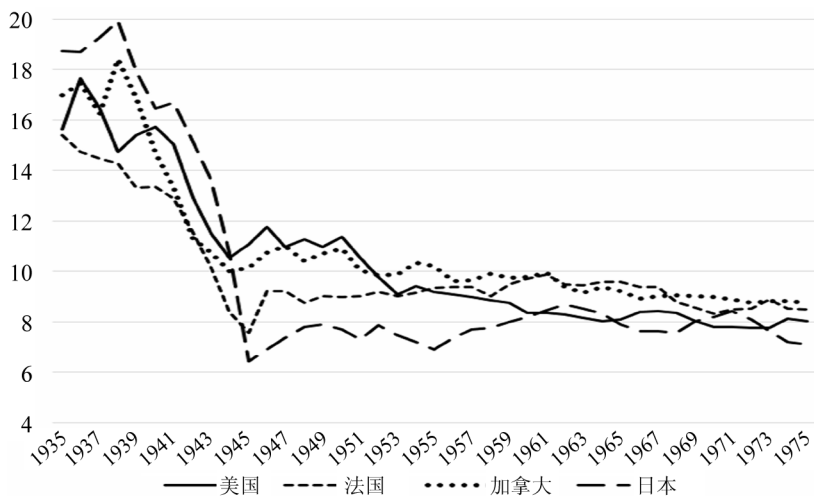
社会上存在着高度的资源不平等已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特征。史前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拥有少量可积累、可继承的有形财产,他们当中的物质不平等程度也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低、流动性高,以及崇尚平等的精神,使得收入或财富的差距并不太大。从距今1万年前的全新世初期开始,当人类首次进行种植庄稼,驯养牲畜,创造出可以传给后代子孙的财富时,不平等就变成了一个历史默认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传承导致世界越来越不平等,这一过程因国家的形成而得以加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成立国家就是为了牺牲平民大众的利益,维护富人和权贵者的利益。这种偏袒愈发

* 本文介绍了笔者的新书《强大的均平机:暴力与贫富不均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主要观点。拙著即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也即将由中国中信出版社出版。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使得随城市化和商业化等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不平等无限放大。^① 这意味着,那些能缩小贫富差距的巨大力量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一些能极大降低贫富差距的机制,而暴力是唯一重要的均贫富手段。暴力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大规模战争、转型性革命、国家崩溃和大瘟疫。下面分别对这四种暴力形式进行讨论。

首先是大规模战争。这主要是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图 1 显示,1930 年代至 1970 年代,在美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这几个主要国家中,占人口 1% 的首富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在图 1 中你会发现一条突然急剧下滑的曲线:在二战前,占人口 1% 的首富阶层拥有国民总收入的 15% 至 20%,但是在战后,其收入所占比例大幅度减少了。

图 1 1935-1975 年占人口 1% 的首富阶层在四个国家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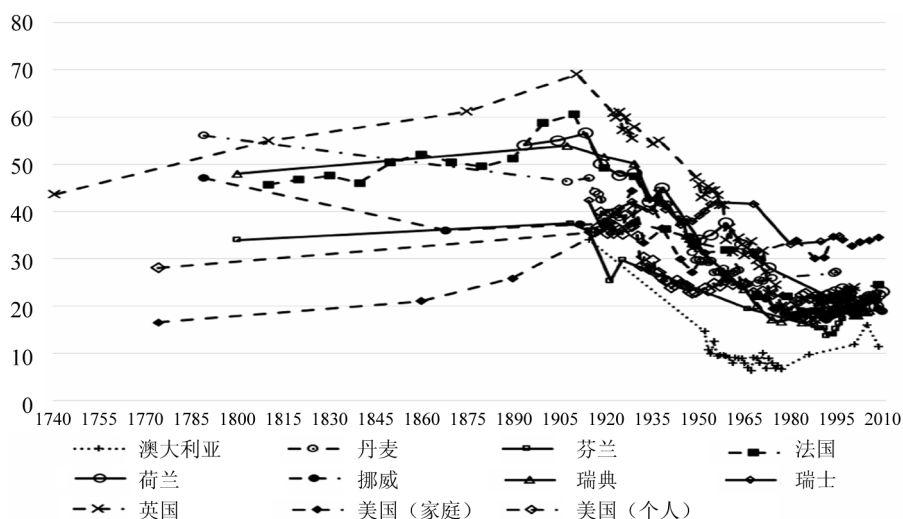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http://www.wid.world/>, 2016 年 9 月 21 日访问。

类似的财富分配趋势在一些西方国家也可观察到。图 2 显示出占人口 1% 的首富阶层在全部私人财产中所占份额。总体看来,他们所占份额在 20 世纪初期达到了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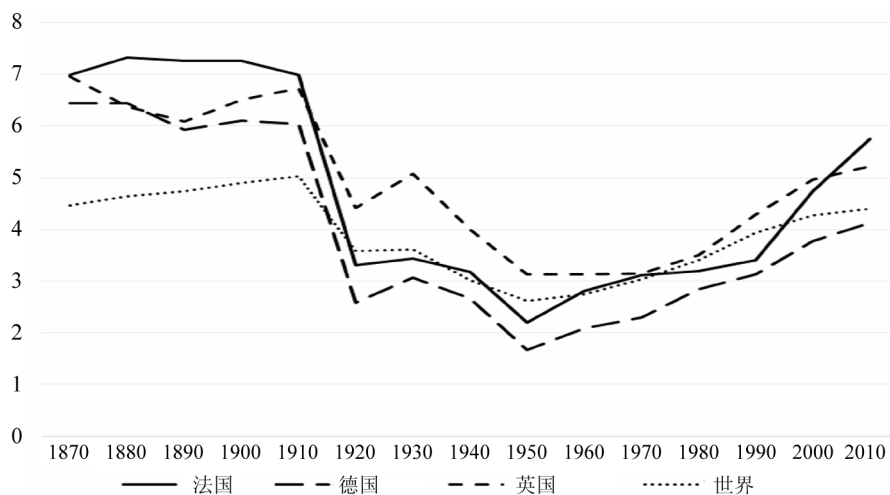
^① 关于这种转变和财富不均的讨论,参见 Monique Borgerhoff Mulder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Science*, Vol.326, pp. 682-688。网上资料参见 <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26/5953/682/DC1>, 2016 年 9 月 21 日访问。关于前现代国家的讨论,参见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8-18; Patricia 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Anatomy of the Pre-modern World*(Second Edition),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2003, pp.35-80; Douglass C. North et al.,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0-109。

图2 1740-2011年十个国家占人口1%的首富阶层所拥有的财富份额(%)



资料来源:Jesper Roine and Daniel Waldenström, “Long-run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图3 1870-2010年法国、德国、美国和世界私人财富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率(%)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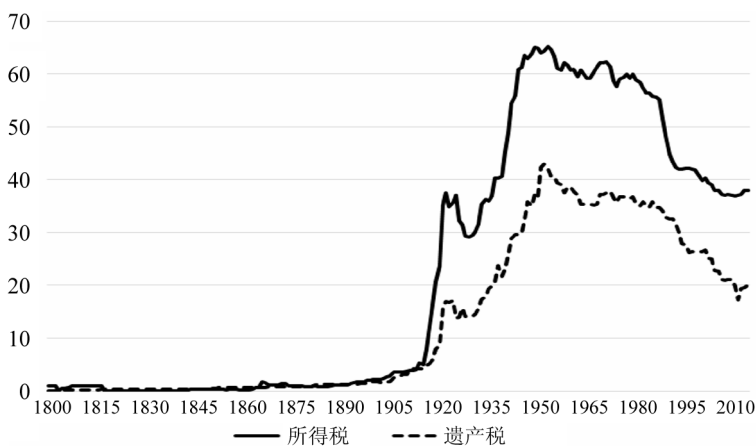
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则大幅度下降。没有发生暴风骤雨般的财产剥夺,财富集中经过较长时间,才因战争震荡而趋于消失,这就是表中曲线下下降比较平缓的原

因,但财富集中的潜在现象却依然如故。^①

图3通过观察私人财富在几个国家的国民年收入中,以及在整个世界的年收入中所占比例,从另一个方向展示这一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私人财富相当于国民年收入的6-7倍。随着战争期间私人财富的缩水,这一比例也发生了变化,富裕的资产阶级同平民大众相比处于失利地位。

所有这些指数都显示出,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经济不平等的差距极大缩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有很多,税收就是其中之一。图4表明,1914年以前,对高收入或巨额财产征收的税率是极低的。来自20个西方国家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税率显著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税率变得更高,此后才缓慢下降。^②

图4 1800-2013年(至今)20国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平均值



资料来源: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税收只是诸因素之一。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股票资本的大缩减,从而引起资本极大减少。与此同时,对非技术性劳工的需求和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整合了分散的工资。政府还实施有利于动员全体国民投入战争的再分配方案。

没收性税率降低了上层阶级的收入和财富,阻止将财富传给后代。国家通常以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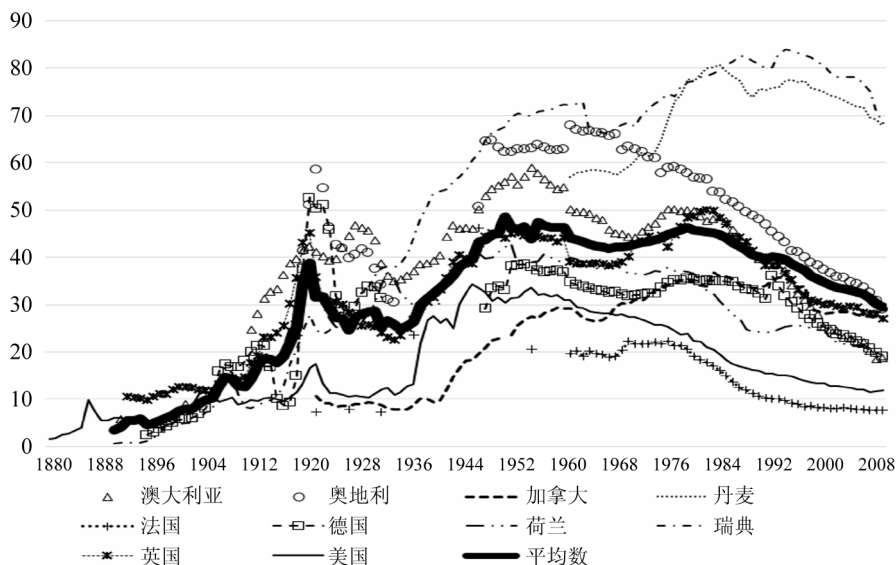
^① Jesper Roine and Daniel Waldenström, “Long-run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in Anthony B. Atkinson and Francois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ume 2A,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15, p.539.

^② 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0. 该书中有关于大规模战争和税收关系更为全面的阐述。

小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介入经济领域,例如,控制物价、工资、租金和股息。一些国家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经历过大规模通货膨胀。战争使得债券和存款荡然无存。在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战斗和轰炸造成的物理破坏加剧了资金丧失。^①

两次世界大战也引发了一系列导致收入和财富平均化的次级发展。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全体男性公民或全体成年公民享有投票权,诸如此类的选举权扩大集中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报答那些为国捐躯的公民的一种方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工会成员暴增。一份全球样本显示,工会势力在194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此后逐渐回落。图5显示,在工人人数比例中,有两个峰值属于美国工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于快速增长的福利国家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财富由富人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最后,冷战带来的诸多挑战鼓励实施更为平等的社会政策,这对西方市场经济具有约束作用。^②

图5 十个 OECD 国家的工会密度,1880-2008 年 (至今)



资料来源: <http://www.waelde.com/UnionDensity>, 2016年9月21日访问。

① See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② <http://www.waelde.com/UnionDensity>; 有关国家财富的论述参见 Jytte Klausen, *War and Welfare: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有关冷战的论述参见 André Albuquerque Sant'Anna, "A Spectre Has Haunted the West: Did Socialism Discipline Income Inequality?", MPRA Paper No.64756, 2015。

所有这一切都有充分的历史记载,并且为人所熟知。问题是,有没有大规模战争导致贫富差距缩小的早期历史例子? 1860年代美国内战符合大规模战争的标准,因为大量男性人口被直接卷入战争。其结果在北方和南方却迥然不同。在获胜的北方联盟那里,军事援助所获得的利润换来了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原来有可能耗损掉收益的累进税。结果,北方的富人变得益发富有,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在南方,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使得包含奴隶在内的种植园主精英的大量私有财产被剥夺。结果南部联邦变得不像以前那么不平等。但是,如果从合众国的全局来看,那么这两个过程彼此抵消,整个国家的不平等仍然保持不变。^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和1800年拿破仑时期的战争也动员了大量军队和众多人口参战,尽管不清楚它们对财富不平等产生了何等影响,但似乎影响不大。即便法国的不平等差距有所缩小,那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本文在后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寻找大规模战争使贫富差距缩小的其他例子,我们必须追溯到古代。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战国时代,以步兵作战为特点战争冲突频仍。各邦国为提高军事力量做了巨大的努力,采取了一些社会干涉性措施。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找到足够证据来判断这些努力是否产生了均贫富的效应。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罗马共和国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大部分罗马公民也被征召入伍。罗马的情况是,统治者骤然暴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财政机制去吸收增长的财富。战争依靠行省贡赋资助,而不需要公民纳税。

这使我们联想到公元前1千纪古希腊城邦文化的例子,这个高度碎片化的环境是以地方性战争和公民高度参与政治和战争进程为特征的。这些情况看起来有助于抑制贫富分化。财富分配措施表明贫富不均水平较低,尤其是在民主制的雅典,累进税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增加了富人的负担,却使普通劳动者受益。从这方面来看,由现代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某些均贫富特点,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早已有之。^②

历史上的大多数战争并未达到全民总动员规模,仅仅是由职业军人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进行战斗。在这种传统的战争模式下,战胜方的精英阶层容易获得财富,而战败方则丧失财富。结果,战胜国的贫富差距增大,而战败国的贫富差距缩小。大帝国尤其促使贫富的不平等扩大。

^① Peter H. Lindert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Unequal Gains: American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17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参见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关于希腊,也可参见 Josiah Ober,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内战对于贫富不均有何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在发达国家比较罕见。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降低了贫富不均,无论是在冲突中,还是在冲突结束后。然而,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内部冲突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在那里却观察到相反结果。一般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内战加剧了较穷社会阶层的收入不平等。内战允许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谋取私利,却干扰穷人进入就业市场,也干扰国家通过税收和再分配等措施缩小贫富差距。^①

以上简要概述表明,只有特殊情况下的战争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而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只有那些把大部分人口卷入其中,并且对全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战争才能降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差距。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第二种暴力性均贫富力量,即革命。在历史上,只有那些真正翻天覆地的,使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发生重组的革命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具有较强说服力的例子来自20世纪。首先在苏俄,随后在中国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经典的例子。两者都包含大规模暴力和强烈的经济干预,例如没收财产,降低工资分配的计划经济,以及集体化。尽管缺乏数据,但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苏联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远低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在东南亚和古巴,革命者接管政权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②

在前近代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进程。同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法国革命的暴力程度较弱。剥夺财产的目标主要针对教会和贵族的财产,部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而且那个时期的战争提高了劳动报酬,因而导致实际收入的增加。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估计显示,这一时期贫富差距缩小的幅度不大:占总人口1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有所减少,而社会上较穷的阶层经济状况比之前有所改善。看起来,革命的规模和强度决定着再分配的影响程度。^③

革命运动在历史上虽不常见,但起义、暴动寻常可见,尤其在农村。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记载的起义、暴动数以百计。然而,这类事件很少能导致实质性的均贫富;1910年代之后的墨西哥和1950年代的玻利维亚是少有的例子。主要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中,农民起义往往失败,这是由于政权能调动超过起义者数倍的武装力

^① 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论述参见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Inequality, Poverty and the Kuznets Curve in Spain, 1850-20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2, 2008, p.302;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论述参见 Cagatay Bircan et al., "Violent Conflict and Inequality", DIW Berlin Discussion Paper, No.1013, March 2010。

^②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③ Christian Morrisson and Wayne Snyder, "The Income Inequality of Fr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No.4, 2000, pp.59-83.

量的缘故。只有包含巨大暴力的转型性革命才能启动实质性均贫富机制。^①

接下来看第三种暴力均贫富机制——国家崩溃。纵观数千年历史,国家的覆灭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整体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一次次地缩小了贫富差距。原因并不难理解。前近代国家维护统治者精英阶层的利益,或保护与统治者有密切联系的阶层利益。政治权力和法律特权转化为不断增加的收入和物质财富。在实行朝贡制帝国里,情况更是如此,那里的精英们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了无穷的致富机会。

朝贡制帝国的疆域越广大,寿命越长久,统治阶级就变得越富裕,不仅在绝对意义上如此,而且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也是如此。

古罗马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命题。从表1可以看到,历史记载的最大一笔财富是随着罗马国家对外扩张和征服其他社会而迅速获得的。右边的指数显示,公元初期几个世纪的罗马首富阶层的富裕程度比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首富阶层高40倍至80倍。财富增长速度比罗马国家本身的增长速度快。当罗马统治下的人口数量增长9倍时,最大财富的数量已扩大了80倍。富人致富同其他人相比简直不成正比。

表1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社会及统治下的人口所拥有最大财产的增加

(1)		
时期	财产*	翻倍
公元前2世纪中晚期	400-500万	1
公元前1世纪	2500万	5
公元前60年代	1亿	20
公元前60年代/50年代	2亿	40
公元1世纪	3-4亿	80
公元5世纪	3亿5千万	70
(2)		
时期	人口	翻倍
公元前2世纪	700-800万	1
公元前1世纪中期	2500万	3
公元1世纪至5世纪前期	6-7亿	9

资料来源: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注:* 按罗马帝国时代的塞斯特银币估算。

^① 关于中国的起义的论述,参见Gang Deng, *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 Routledge, 1999;关于拉丁美洲的论述,参见Solon L. Barraclough, "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Other Actors", UNRISD Discussion Paper, No.101, 1999。

中国古代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不多,但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过程。在汉、唐两代,有门路的权贵们利用职务之便,大量兼并土地。官府屡禁不止,无能为力。

王朝的崩溃使这一过程发生了逆转。国家的覆灭给精英阶层带来无比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与普通人相比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他们因国家剥削制度的崩溃而丧失了收入来源,其个人财产也面临巨大危机。在极端的例子中,前朝的精英变得一贫如洗,甚至从此消失。

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包括:公元前1200年之后,希腊青铜时代迈锡尼文明的崩溃,公元前1千年前墨西哥玛雅文明的崩溃,以及中世纪晚期柬埔寨吴哥王朝的灭亡。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多例子。公元9世纪,唐王朝灭亡之际,京畿地区的富人精英纷纷遭遇灭顶之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上层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大量丧失导致贫富差距缩小,尽管人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①

均贫富的变化甚至有可能超出社会范围。以公元1千年罗马统治前、统治中和统治结束后的不列颠为例。考古学家对许多私人住宅的房屋规模做了研究。结果表明,公元5世纪罗马统治崩溃之后,房屋的平均面积急剧缩小了。但从前的罗马式房屋不仅仅是面积较大而已,还有更多不平等之处:罗马人统治时期与之后的时期相比,房屋面积差别更大。这反映出,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与帝国崩溃之后相比,前一时期的消费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精英享有更多特权。^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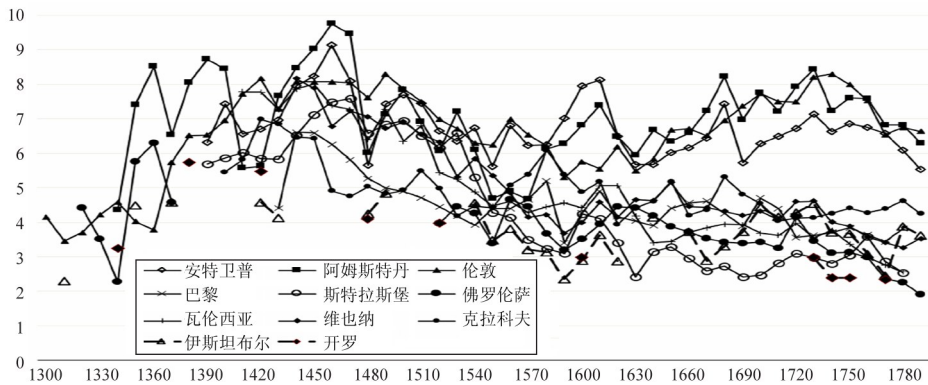
现在来看第四种均贫富的暴力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严重的瘟疫爆发会导致数百万的人口凋零,从而降低了收入与财富再分配的差异。

最著名的例子是“黑死病”这种14、15世纪肆虐欧洲以及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瘟疫。这使得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下降,工人待遇提高,资本家变穷。正如图6所示,在瘟疫爆发期间,欧洲不同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一倍。当瘟疫过去,人口复原时,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至原先水平。因瘟疫而导致实际工资上涨暂时缩小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鸿沟。工人们的饮食、衣着和其他生活方式得到了改善,地主和资本家却遭受收入缩减之苦。

^①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关于唐朝的灭亡,参见 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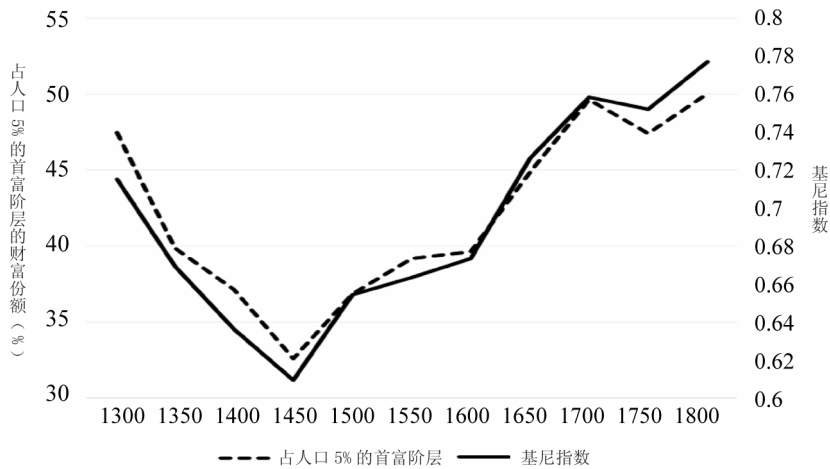
^② Robert Perry Stephan, “House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Trajectories in the Roman Worl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13.

图6 1300-1800年欧洲和黎凡特地区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Şevket Pamuk,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II*, 2007, p.297。

图7 1300-1800年皮埃蒙特地区城市占人口5%的首富阶层的财富所占比率和财富分配基尼指数



资料来源:Guido Alfani, “Economic Inequality in Northwestern Italy: A Long-term View (Four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75, 2015, p.1084。

意大利自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税收记录证实了这种情况。意大利各城市曾征收个人财产税,并进行财产调查。这些记录有时保留下来,使我们能够掌握不同时期的私人财产分配情况。从图7可以看到,占社会人口10%的首富阶层的财富份额与表明财富集中的基尼指数,在瘟疫爆发期间都有所下降,瘟疫结束之后,则获得恢复和

增长,以至于超过从前的水平。

最近的研究著作记录了墨西哥的可比性过程。1492年,欧洲人来到美洲,带来了新的疾病如天花和麻疹,造成美洲原住居民的人口骤减。黑死病也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相似后果。在墨西哥中部,工人的实际工资因人口减少而上涨了百分之几百,人口缩减必定也缩小了整体收入分配的差距。^①

更早的例子来自大约1500年前,古典时代终结、中世纪开端时期。来自埃及的档案记录显示,长期以来,农村工匠的报酬低廉。公元541年,当瘟疫首次爆发,导致数以百计的人口死亡时,劳动力需求上升,实际工资上涨了150%。一旦瘟疫过去,工资水平又恢复如前。同样可以推测,这会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只是在暴力震荡发生之际的有限时间内。^②

以上依次讨论了四种均贫富机制。实际上,其中两种或更多种因素有可能同时出现。例如,俄国和中国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试举一个近代早期的例子。大约1600年,奥斯伯格(Augsburg)这座德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财富分配极为不平等,基尼指数高达0.9。这意味着,少数人拥有几乎所有的财富,而绝大多数居民除了衣服和最基本的个人用品以外,一无所有。30年战争改变了一切。奥斯伯格被围困和占领,富人的财产大量被摧毁。接踵而至的瘟疫也夺走了大批穷人的生命。双重暴力震荡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大幅度降低,基尼指数由0.9降至0.75。^③

至此,你也许会思考与此相反的和平机制的作用。是否存在某种与巨大的暴力、灾难和人类的痛苦无关的均贫富机制呢?答案并不乐观。看起来,除了前面列举的四种暴力机制之外,似乎不存在其他不同类型的能发挥同样巨大作用的均贫富机制。^④

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土地分配是导致贫富不均的最具决定性的重要因素。试图把富人占有的土地分配给贫穷的劳动者,这类土地改革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和平的土地改革一般对减少贫富不均无济于事。精英们或者得到损失补偿,或者设法操纵改革过程,使其对自己有利。凡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贫富不均的成功改革,一般都有暴力行为相伴随,或者是在暴力威胁下,出于对暴力的恐惧才采取的改革。例如,1940年代后期韩国实行土地改革主要出于对朝鲜共产党政权的担忧。1949年之后,

^① Leticia Arroyo Abad et al., "Between Conquest and Independence: Real Wages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Spanish America, 1530-18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49, No.2, 2012, pp. 149-166.

^②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③ Jan Luiten Van Zanden, "Trac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Kuznets Curve: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8, 1995, pp.643-664.

^④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该书作者考察了其他不同因素。

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同样是对大陆共产党政权的焦虑所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之后,美国支持在拉丁美洲实行土地改革计划,目的是防止革命进一步蔓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其潜在的暴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①

没有证据表明,废除债务能产生持久的均贫富效应。金融危机只能短期地减少贫富不均。2008年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富裕者阶层的收入份额锐减,但在随后四年时间里完全恢复过来。从前的经济危机也见证了同样迅速的经济复原,就连1930年代的大萧条也没有对减少贫富不均产生持久影响。^②

民主制对于财产平等程度没有起到成体系的与持久的作用。这看起来令人惊讶,考虑到人们本来以为选民们会支持限制富人集中收入与财富的政策,但是民主制体系的特点千差万别,往往纵容精英们保护自己的利益。^③

工会中的成员比例确实对贫富不均具有深刻影响:工会中的劳动者所占比例越高,工会的力量就越强,贫富差距就会降低。然而,正如我在前面的描述,工会运动不应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因为它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这使我们转向深受西方经济学家青睐的两种机制。一种是19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奈茨(Simon Kuznets)建立的模式。他假设,起初经济发展会引起贫富不均,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低薪酬的传统经济部门转入高薪酬的现代经济部门时,贫富差别将会缩小。从全球角度通观世界经济,则该假说不能被证实。我们只能说,经济发展与贫富不均之间不存在系统的联系。这意味着,不能指望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以和平的方式抑制贫富不均。^④

另一种机制涉及教育和某种类型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所谓“教育和技术的竞争”。其潜在的意识是,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将改变劳动力需求。除非教育顺应这种要求,否则经济领域的薪酬将变得越来越分散,收入不均将扩大。不可否认,该理论总体而言是对的。然而,不同部门在工资分配方面的平均性变化,反过来作用于较高级的教育,这与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近年来,在拉丁美洲,教育的扩大的确

① Solon L. Barraclough, “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other Actors”, UNRISD Discussion Paper, No.101, 1999; 关于现在的情况,也可参见 Michael Albertus, *Aut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The Politics of Land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

③ Acemoglu Daron et al., “Democracy, Re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 in Anthony B. Atkinson and Francois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ume 2B,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15, pp. 1883-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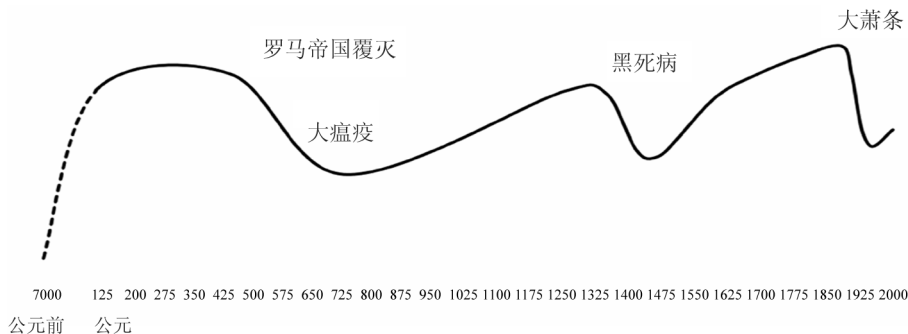
④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5, 1955, pp.1-28. 反对意见参见 Klaus Deininger and Lyn Squire,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7, 1998, pp.259-287; Garth Frazer,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across and within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34, 2006, pp. 1459-1481; Luis Angeles, “An Alternative Test of Kuznets’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8, 2010, pp. 463-473。

对于抑制贫富不均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拉丁美洲的贫富差距,依据全球标准依然保持很高水平,而且也不清楚所取得的这些进步能否持久保持下去。^①

总而言之,没有合适的历史证据证明,依靠和平手段能有效减少贫富不均。实际上,财富和收入在集中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诸如国家形成和经济发展)和暴力震荡,从长远来看,对于贫富不均的演进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一演进过程置于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长河中进行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我们所谓的“超级曲线”。

从图8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它显示了过去大约9千年的欧洲长时段贫富不均情况。随着农业扩散,贫富不均逐渐增长,在公元前1千纪,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罗马帝国的崩溃和瘟疫降临摧毁了精英阶层,但对工人阶层有利,贫富不均因而有所下降。中世纪中期,由于城市和商业的扩张、人口的增长,贫富不均再次上升。这一过程在中世纪晚期因瘟疫而被打断,暂时受到抑制。相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阶级从中获益更多。大约1500年瘟疫结束后,欧洲国家的贫富不均急剧扩大,长达4百年之久,贫富不均的水平超越以往。到19世纪,许多欧洲社会的贫富差距已达到最大限度。两次世界大战的暴力震荡导致了一场“大压缩”运动,它极大地缩小了收入和财富差距。自1980年代起,贫富不均又缓慢上升。

图8 欧洲长时段财富不均走势



资料来源: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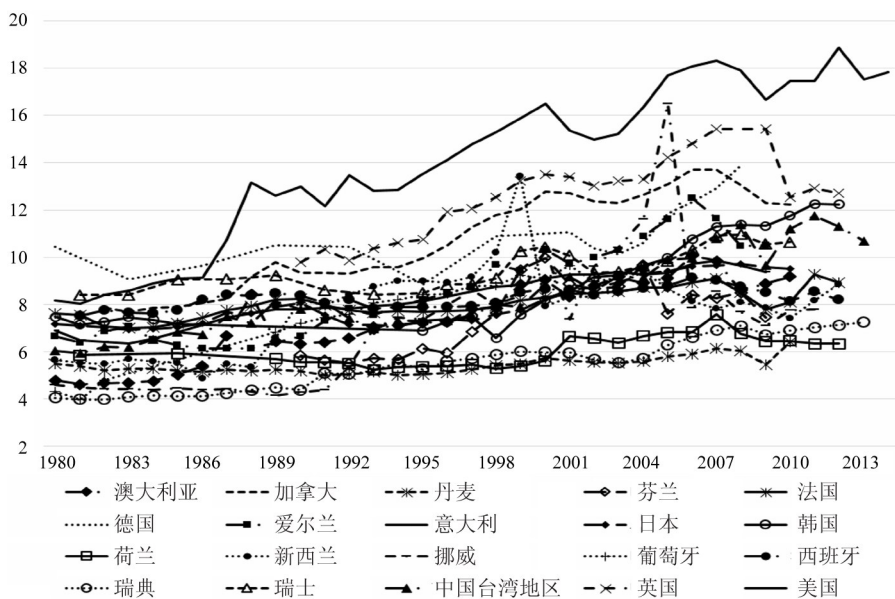
^① 关于美国的论述,参见 Joseph P. Kaboski, “Supply Factors and the Mid-century Fall in the Skill Premium”, Working Paper Kaboski 2005; Claudia Goldin and F.Katz Lawrence,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4, 60, 67, pp.84-85。关于拉丁美洲的论述,参见 Giovanni Andrea Cornia ed., *Fall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Policy Changes and Les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在美国也能观察到类似趋势。贫富不均水平在殖民地时期非常低,因为与欧洲不同,美洲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十分充足,富人精英阶层尚未固化。贫富不均 在 19 世纪随着奴隶制传播和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增长,到 1920 年代达到最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压缩了贫富差距。自 1980 年代起,美国的收入差距几乎恢复到 1920 年代的最高水平。^①

理论上,也可以为中国绘制一幅相似的数据图。倘若如此,那么自汉朝以降的诸朝代恰好与贫富不均增长阶段相吻合,而在改朝换代的间歇期,有可能通过剥夺精英阶层的财产而缩小了贫富差距。1950 年代共产党执政导致贫富差距的水平相当低,直到 1980 年代初期。从那时起,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贫富不均急剧扩大。

图 9 显示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中 1% 的最高收入者财富所占份额。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富者财产份额自 1980 年代以来增长了 1.5 倍,涨幅为 4-8% 至 6-12%。可以看出,美国增长势头较猛,但如果拿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台湾地区的贫富差距增长幅度更大。丹麦是唯一的收入差距相对稳定的例子。

图 9 1980-2013 年 16 个国家和地区中最高收入者的财富所占份额 (%)



资料来源:“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

^① 关于这类趋势,参见 Peter H.Lindert and Jeffrey G.Williamson, *Unequal Gains: American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17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贫富不均在现实世界的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在美国,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具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促使著名观察家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约瑟夫·史迪利茨(Joseph Stiglitz)纷纷提出旨在反对和缩小贫富不均的政策调整方案。中国也有一些讨论这个问题的研究报告。^①

这些文献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历史的语境化和对历史的同情地理解。过去,降低贫富不均的政策变革一般都与暴力震荡联系在一起,或者源于暴力震荡的经历,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和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冷战。在和平背景下能成功降低贫富不均的政策,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相应证据。

大规模战争、转型性革命、国家崩溃和大瘟疫,这些传统的奏效机制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而且我们也不希望它们重现。即便再有一场世界大战,也不会有数百万军队作战。当前也没有能引发转型性革命新浪潮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弹性,比过去更深入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国家不易崩溃。例外的只有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目前的中东地区。新瘟疫有可能爆发,但可以通过预先监控和遗传得到抑制。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震荡的世界,而暴力震荡在历史上曾经抑制了贫富不均。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但它带来了未来如何抑制贫富不均的问题。贫富不均在世界各地持续扩大。在缺乏暴力震荡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和平方式抑制贫富不均呢?如果历史可以为鉴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比我们当前所意识到的更为严峻。一个有序而稳定的世界带来了诸多福利,但它显然并没有带来缩小贫富差距的福利。

(作者简介:沃尔特·谢德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thony B. Atkinson and Francois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Volume 2A, pp.469-592; Joseph 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Norton, 2013. 关于中国的论述参见“Some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http://www.gov.cn/zwjk/2013-02/05/content_2327531.htm, 2016年9月21日访问。